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inguistics]**

Leo Marx's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Pastoral Ideal as Event

^{1, 2}JIANG Zhaoxia

¹Nanjing University, China

²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ina

Received: July 27, 2026

Accepted: August 28, 2026

Published: September 30, 2026

To cite this article: JIANG Zhaoxia. (2026). Leo Marx's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Pastoral Ideal as Event. *Asia-Pacific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3), 152–158, DOI: 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6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s://doi.org/10.53789/j.1653–0465.2026.0603.016>

Abstract: Leo Marx's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2011) not only distinguishes sentimental pastoral ideal from the complex pastoral ideal, but also traces its transformation from a literary form into a social vision—the middle landscape. Drawing on Derek Attridge and Terry Eagleton's discussions of the eventfulness of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pastoral ideal into America constituted an important event in literary history.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pastoral ide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volved not only the significant transformations in the paradigm of pastoral writing, but also its convergence with social events such as colonial expansion and projects of nation-building in the New World. It was in this very process that it became a dominant paradigm for the articul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and social experiences. What's more, Since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ecocriticism has opened new possibilities for the increasingly marginalized American pastoral tradition.

Keywords: Pastoral Ideal; Eventuality; Garden; Strategy; Evolution

Notes on the contributor: JIANG Zhaoxia, female, born in Linyi, Shandong Province. She is a doctoral student at Nanjing University and a lecturer at th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Anhu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er research interests lie in contemporary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Her email address is 66256526@qq.com.

利奧·馬克思《花園裏的機器》中 美國田園理想書寫的事件性流變

^{1, 2} 姜兆霞

¹ 南京大學; ² 安徽工業大學

摘要：在《花園裡的機器：美國的技术與田園理想》(2011)一書中，利奧·馬克思不僅辨析了情感型和複雜型田園理想的區別，更探討了田園理想從一種文學形式向『中間風景』社會構想的變異過程。本文試從阿特里奇和伊格爾頓等人的文學事件性論點出發，認為田園理想引入美國是文學史上的一次事件性輸入。田園理想在美國的本土化過程，既是其文學書寫範式發生事件性變化的過程，又與當時的殖民拓荒以及新大陸的國家建構設想等社會性事件形成共謀，成為書寫美國文化和社會經驗的主導理念的過程。同時，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生態批評的興起和日益蓬勃又為日漸式微的美國田園書寫尋求事件性新變提供了契機。

關鍵詞：田園理想；事件性；花園；策略；流變

利奧·馬克思的《花園裡的機器：美國的技术與田園理想》(2011)(英文版發表於1964年)自發表以來，一直被認為是研究美國環境文學和自然地位的抗鼎之作。^①勞倫斯·布伊爾稱贊該書是『美國文學中最好的書寫自然地位的書』。在勞倫斯看來，自然『一直被認為是美國國家性的關鍵構成之一，美國文學經典形成伊始，就一直特別關注鄉村問題和荒野問題』(Buell 1995: 11, 33)。但《花園裡的機器》不僅是一部有關美國自然地位的文學評著，更從文化角度抓住了美國文化中的核心衝突，探討了美國田園理想的矛盾內涵，將美國田園理想喻指為一種書寫美國經驗的『主導理念』。在《花園裡的機器》一書中，利奧·馬克思不僅辨析了情感型和複雜型田園理想的區別，更探討了田園理想如何在美國這塊特殊的土壤中落地、生根、發芽，並茁壯成長為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本文試從伊格爾頓等人的文學事件性論點出發，認為田園理想引入美國是文學史上的一次事件性輸入。田園理想在美國的本土化過程，既是其文學書寫範式發生事件性變化的過程，又與當時的殖民拓荒以及新大陸的國家建構設想等社會性事件形成共謀，成為書寫美國文化和社會經驗的主導文學範式。《花園》一書最後通過對美國經典作家作品中的複雜型田園敘事的分析，^②一方面說明美國的政治、工業發展以及社會變化使得田園理想再次從社會現實流向了文學想象，反映出上世紀末和新世紀初田園理想在美國的式微；另一方面，二十世紀中期以來，生態批評的興起和日益蓬勃又為日漸式微的美國田園書寫尋求事件性新變提供了契機，同時，也為現代性社會尋找田園理想的替代物留下了開放性的思考空間。

一、田園理想的事件性輸入

阿特里奇在《文學的獨特性》導言中就指出文學作品被當作事件來體驗而不是對象來認知，且事件可以一再被重複、每次重複並不完全雷同這一事實已得到很多人的認可。(Attridge 2004: 2)田園理想被輸入美國大陸是美國文學史上的一次事件性輸入，自此之後田園書寫在美國不斷被重複，且每次重複都因歷史和社會文化語境的變化而被賦予了不同的內涵。美國文學中田園書寫的真正源頭是維吉爾的《牧歌集》



(Eclogues), 維吉爾在詩歌中構建了自己的象徵性風景阿卡狄亞(Arcadia), 其中甜美的鄉村風光和平靜、悠閒的田園生活以及吹著笛子的提氏盧斯(Tityrus)成為這種浪漫主義田園理想的代表。自大發現時代以來, 這種浪漫的田園理想一直被用來界定美國的含義,

早期殖民地作家的作品中充分展現了美國生活狀況與田園理想之間的密切關係。從 1584 年亞瑟·巴洛(Arthur Barlowe)將弗吉尼亞描述為一個『驚人豐饒』的巨大花園, 到約翰·史密斯的《弗吉尼亞通史》(1624), 再到羅伯特·貝弗利的《弗吉尼亞的歷史與現狀》(1705), 『新世界』荒野大陸上的花園意象已被牢固地確立了起來。利奧·馬克思認為莎士比亞的《暴風雨》(1612)預演了一出完美的美國田園寓言, 並認為《暴風雨》與美國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第一種聯繫是『生成性的(genetic)』, 它將該劇的主題與伊麗莎白時代對新世界的矛盾看法聯繫起來, 即在伊麗莎白時代美國意象的光譜上, 一端是可怕的荒野, 另一端是『驚人富饒』的花園。這種自然的含混性最大程度地激發了舊世界對新世界的田園想象。第二種是預示性聯繫(prophetic), 認為《暴風雨》從總體模式上生動地預演了經典的美國寓言模式, 尤其是遠離社會走向自然的救贖旅程的理念。在這裡, 普洛斯彼羅的荒島社會預示了傑弗遜對理想的弗吉尼亞的想象, 這塊想象的土地既擺脫了歐洲的壓制, 又擺脫了邊陲的野蠻;《暴風雨》中的地理狀況預示了美國想象的道德地形。

早期殖民拓荒者將歐洲田園理想的文學引入與其在美國的殖民擴張歷史巧妙的結合起來, 生動的演繹了文學虛構與社會現實之間的模糊邊界, 即『事實可以是虛構, 虛構也可以是事實』, 意思就是在文學中『既可以將事實進行虛構化處理, 將其融入進虛構的遊戲, 其結果就是虛構性敘事完全來自於經驗現實』(Eagleton 2012: 118)。自大發現時代以來, 作為一種文學想象和社會現實的田園理想就一直並存, 成為早期殖民者, 主要是英國殖民者對新世界展開想象的工具之一。^③布林克利指出, 新大陸對英國的吸引力在於其全新, 在於和問題百出的國內現狀的對比, 美國似乎是一個人類可以重新開始的地方, 可以擺脫舊世界的種種弊病和不平等現象, 建立一個完美的新社會。(布林克利 2009: 22) 田園理想的文學工具性在早期殖民者的政治和商業活動中被最大化, 雖然這正是阿特里奇所要反對的觀點(Attridge 2004: 7-9)。

二、田園理想的事件性變化：花園神話和機器意象

田園理想的書寫不僅為舊世界在美國的殖民活動提供了文學想象架構, 其在美國本土的操演還經歷了花園意象的神話化過程和機器意象的併入, 並與傑弗遜的建國構想密切相連。利奧·馬克思在《花園》在第一章就明確了要探究的問題包括『田園理想如何與新世界的生活環境相契合, 如何成為美國式的一種社會理論, 以及在工業化浪潮衝擊下發生了甚麼樣的變化』(1)。田園理想真正落戶美國新大陸後催生出來的是『中間風景』的社會構想。『中間風景』是徹底美國化的田園理想, 傳達的是美國社會在進步主義與原始主義、人與自然、荒野與文明之間尋求平衡與調和的社會願景。到 1785 年傑弗遜發表《弗吉尼亞紀事》(Notes on Virginia)時, 田園理想已被『清除出』它所屬的應用於現實的文學傳統, 轉而發展成『類似於意識形態那樣無所不包的東西』(64)。

值得注意的是, 田園理想在美國的盛行還與 18 世紀盛行的『中間態』社會理論密不可分。此時的歐洲社會普遍相信『中間態』(middle state)也許是人類的最佳狀態, 這一倫理觀點產生的社會學結果就是崇尚鄉村生活。亞瑟·洛夫喬伊稱之為『中間倫理』(ethic of the middle link), 即人是『存在的大鏈條』上居於中間環節的生物, 位於低級與高級、動物性與知性的各種存在形式之間的過渡點。^④依此觀點, 人必須在其動物本性與理性理解之間接受一種無法令人滿意但又不可避免的折中。『中間態』理論在 18 世紀的廣受歡迎一方面是因為要調和進步主義者和原始主義者之間的激烈爭論, 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它契合了田園理想的深層訴求。彼時, 由於『大發展』運動和圈地運動對古老鄉村生活的破壞, 這階段的英國人普遍把美國看做田園, 認

為『在美國為鄉村的美德建立家園尚不算晚』(76)。與此同時,《一個美國農民的來信》(1782)不但在開篇就構建了一個典型的田園情境,更因為著者自身的農民身份,而突出了田園理想在新世界環境里的真實性。田園理想在此不僅是『寄生』於現實的一種文學形式、一種對現實的文學化陳述,它是一種文學策略,更是美國社會構建現實新世界的社會『策略』。坎利夫就認為在彼時美國平權主義的社會風氣下,田園理想沒有自足於『一種文學構想、文學策略,而是散溢開來,成為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和真實描繪』(Cunliffe 1965)。

田園理想書寫這種新的、創造性的對現實生活的思考和關照是一個漸進的過程,也是一個對傳統田園內涵翻新的過程。如阿特里奇所強調的,文學的創造既是行動也是事件,是有意的也是無意的;突破傳統與熟悉的過程即是迎接『它者』的過程,傳統與熟悉被突破的事件亦是『它者』入侵的事件(Attridge 2004: 26)。田園理想在美國的本土化過程即是這樣一個動態的、充滿事件性的過程,其中伴隨著花園神話的確立和機器入侵事件的發生。傑弗遜在《弗吉尼亞紀事》(1785)中對田園理想是持非常明確的肯定態度的,同時他認識到需要『不斷的重新界定「中間風景」的理想,不斷推進這一模式,從而使之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101)。偉大的傑弗遜夢想(the Jeffersonian dream)就是把整個美國改造成一座花園,一個永久的鄉村共和國,田園理想搖身變成一個偉大的田園方案。亨利·史密斯在《處女地》中表示,直到20世紀將荒涼的腹地改造成為『世界的新花園』的思想仍然主導著美國人的想象,並促進了一系列社會改革的實施,它甚至成了『一個集體象徵,一個詩意的理念……花園這一主象徵包含了一組表示幸福、成長、增加以及在土地上幸福勞動的隱喻』(史密斯 1991: 124)。此後一百多年以來,美國人民所堅守的田園理想與傑弗遜在1785年所提出的田園理想並無二致,甚至在這一理想中注入了神話的品質,『美國人只要還認為他們是作為一個民族來行動,就等於認為自己是在以花園的意象來構建社會』(103)。田園理想是一種文學描述還是一種社會操演,其界限已難以分辨,如沃爾頓所說,『讀者想象的活力會由於其所想的是真實的這一事實而得以增強』(轉引自Eagleton 2012: 127)。花園意象的神話化使得有關田園理想的想象和建設花園社會的現實成為共謀。《花園》提醒我們的是傑弗遜最終『認識到理想的中間風景社會是無法實現的,所以他只是視之為一種範本,一個指導長期政策時的嚮導』(104),在此意義上,『中間風景』的田園理想已經充分發揮了伊格爾頓所倡導的文學的意識形態功用或政治功用。

本土化的田園理想在美國新大陸的強大生命力在於它的生成、發展總是契合美國大陸的環境特點,同時又緊隨社會的變化,不斷吸收新的元素,其內涵也不斷豐富。米克爾也認為美國的田園理想完全不同於它的歐洲原型,『舊世界模型』假定的是社會的靜止狀態,而美國是一個不斷發生巨大變化的地方(Meikle 2003: 151)花園意象的神話過程伴隨著田園理想與機器技術之間從角力到接納的過程,從文學形式和社會現實兩個層面不斷為原初的象徵性風景阿卡狄亞(Arcadia)注入新的元素。當傑弗遜把機器的作用局限於『推動著荒野變成一個中間風景的社會』時(109),以屯徹·考克斯(Tench Coxe, 1755—1824)為代表的少數人則敏銳地預見到了製造業和機器技術對美國的重大意義,並利用當時的主流意識形態話語,把工廠和機器融入田園鄉村場景,使其成為實現中間風景之社會理想的必然選擇。及至1791年亞歷山大·漢密爾頓提交《關於製造業的報告》,這些觀點已被社會普遍接受。利奧·馬克思指出1786年至1831年期間,機器意象已經成為一個重要的價值象徵,像花園意象那樣無所不在,並『被用來承載暗示、思想和情感等內容』(137)。喬治·依尼斯(George Inness)的《拉克瓦納河谷》畫作(1955)中表現的技術人造物與風景融為一體的景色成為新田園理想的完美詮釋。新田園理想(工業化的田園理想)的出現說明技術是創造世界新花園的這種信念已深入美國文化的骨髓,其目標至少在理論上講是一種『中間風景社會,是一個展示了在人工與自然之間幸福平衡的鄉村國度』(165)。只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它不再適合做一種社會構想。時至1988年,利奧·馬克思本人對《拉克瓦納河谷》的解讀也發生了變化,他認為畫作呈現的意義遠超越出了風景里的協調,它傳達的是一種深刻矛盾性,一種田園風光里的不詳預感;它代表的是物質發展帶來的深層道德含



混(Meikle 2003: 154)但田園主題仍被保留下來,成為『工業化浪潮里的一種修辭公式,一種只在想象中存在的神話目標』(Woodman 1965: 662)。與此同時,田園理想與工業現實間的衝突為美國社會和文學提供了最有活力的主題和話語,依詹姆斯所言,『它是關於美國的所有最終推論的萌芽』(259)。這一點在美國經典文學作品中隨處可見。

三、複雜田園變體之後:田園理想路向何方?

田園理想這一文學模式在美國的本土化過程既很好的說明瞭文學是一種社會實踐,又詮釋了文學作為一種策略的建構功用。它恰到好處地契合了伊格爾頓分析的文學的本性,即它既『是現實又是一種烏托邦』,成為全面而即時地闡釋美國經驗的主導性主題和範式(Eagleton 2012: 161)。利奧·馬克思認為美國社會文化中有兩種不同類型的田園理想互相交織,難以界定。一種是情感型田園理想,它主要是『一種情感表達』,『廣泛散播於我們的文化中,潛移默化地滲入各種舉止行為之中』(2-3)。情感型田園理想往往寄情於淳樸的自然風景,傾向於將簡單且原始的生活狀態予以理想化。因此,情感型田園理想成為普羅大眾逃避現實的諸多途徑之一。對利奧·馬克思來說,美國文化中的這種田園衝動『是實現孩子氣的夢願的起點,是一種瀟灑的懷舊情緒,是一種天真而混亂的原始狀態』(7),但同時也是嚴肅文學的創作源泉。美國許多經典作家,如梭羅、福克納、海明威等,他們的創作或許亦是植根於日常生活中的這種大眾型田園情感,但其創作結果卻轉向了一種『更為高級』的複雜型田園理想模式。一個典型就是 1844 年霍桑在馬薩諸塞州康科德鎮附近的樹林里記錄的『睡谷』隨筆。隨筆中也許是隨機記下的一件『小事』——和諧寧靜的自然風光中突然傳來了火車的汽笛聲——而圍繞這件『小事』卻形成了某種模式,此後睡谷事件(Sleepy Hollow Episode)的各種變體處處出現在 1840 年以來的美國經典文學作品中。利奧·馬克思認為霍桑筆記是美國文學中反復出現的隱喻模式開始形成的標誌,也是複雜型田園理想的範式。睡谷這一母題的重大啓示作用在於它具體設計出了美國工業技術初露端倪時的象徵性風景(symbolic landscape):它是兩個世界之間相對比的變體,一邊是鄉村的安寧和淳樸,另一邊是技術世界的複雜和權力。這種複雜型田園理想模式中隱含了文學與意識形態以及文學與歷史之間的複雜關係。它既是阿卡狄亞(Arcadia)象徵性風景的繼承,又為其注入了現代技術文明的『它者』元素。睡谷母題與阿卡狄亞田園理想之間這種動態的『關係狀態』使得它既保存了田園理想的既定內涵,又賦予田園理想以新的內容和獨特性。^⑤

據此利奧·馬克思在《花園》中重點探討了『睡谷』母題的三種不同闡釋,即超驗母題、悲劇母題和鄉土母題。它們分別代表了三種不同的複雜浪漫主義田園理想敘事,這三種對『睡谷』的不同闡釋是對田園理想模式吸收後的再創新,是其在美國社會語境下產生的新的田園變體,它們圍繞美國工業技術初露端倪時的象徵性風景——田園生活與技術世界的衝突——分別給出了自己的闡釋。愛默生和梭羅是複雜田園敘事中超驗母題的代表。對於梭羅而言,實現黃金時代(田園理想)完全是『個人的事情』,其實也就是『一種文學體驗』(193)。田園理想顯然已經無法在歷史中實現,將其重新置於文學之中,置於《瓦爾登湖》(1854)中,是梭羅能想到的唯一出路。霍桑和麥爾維爾為『花園裡的機器』母題匹配的人生觀比梭羅的要悲觀許多。與霍桑不同的是,伊希梅爾在『裴廓德號』上最危險的地方再次發現了綠色的田野,說明瞭田園理想的實現必須與其現實對立面相結合。麥爾維爾在《白鯨》(1851)中傳達了『一種理想與其對立面不可分離的複雜的田園思想』(233)。在鄉土母題上,利奧·馬克思認為《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1884)最為生動地表現了田園方案與美國經驗的相關性。故事結尾哈克高尚的撕信瞬間間接地說明瞭木排上幾近完美的田園牧歌式生活最終只能在文學的想象中實現。而整個寓言的隱喻結構——木排最終無可奈何地飄向南方蓄奴制地區披露的是貫穿於複雜型田園結構中的悲劇主線。

『睡谷』母題的三種複雜型田園敘事的變體是田園理想範式在美國本土語境下的三種不同操演,是游走於田園範式與美國社會現實之間的建構過程。這種建構(Structuration)過程,在伊格爾頓看來,喻指的是一種結構——但是是一種行動中的結構,一種不斷重構自我的過程性結構(Eagleton 2012: 199)。田園理想最初的輸入為早期歐洲殖民者和美國人民提供了無限的文學和社會想象空間,隨著 19 世紀美國科技的『起飛』、經濟的發展和政治獨立的需求,舊有田園模式適應現實需求不斷進行自我調整和被調整是不可避免的。正如羅蘭·巴特所說,『世上的文學從不是為了回答它所提出的問題,正是這種懸置構建了作品的文學性;這也正體現在置於尖銳問題與沈默的回答之間的脆弱的語言上』(轉引自 Eagleton 2012: 174)。文本從來就不能提供醫療診斷般的回答,文學提供的只是一種策略,一種架構,一種架構現實與想象的方式。田園理想在美國的書寫流變就很好的說明瞭這一點。自 19 世紀以來,美國最傑出的作家們一直在探討鄉村田園神話與技術事實之間的矛盾,《瓦爾登湖》、《白鯨》以及《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的結局在典型的現代寓言中不斷重現。《花園》的最後一章『燼園』提到的《偉大的蓋茨比》中的田園寓言結局已然不能令人滿意,但同時蓋茨比的經歷又反映出田園理想在美國的式微。利奧·馬克思認為這是因為『原來的調和性象徵已經過時』(270)。田園理想從大發現時期殖民者對新大陸的田園幻想,到指導美國『起飛』時的一種社會構想,最後到文學中的各種複雜田園理想敘事變體,其本身在美國新大陸的一系列流變,既有其自身書寫模式的事件性流變,又與外在的殖民拓荒歷史以及美國建國初期的技術『騰飛』等社會事件息息相關、相互應和,成為美國文化中一股獨特的洪流。

毫無疑問,田園理想已經成為架構美國文學想象和日常生活想象的獨特策略,它集中簡化並突出了美國文化中的核心矛盾。蔡斯在《美國小說及其傳統》的開頭就提出,美國最優秀、最典型的小說的想象力『是由我們文化中的矛盾而不是和諧統一決定的』。美國小說『往往存在於矛盾中,存在於及其廣泛的經驗中。當它試圖解決矛盾時,總是以間接的道德兩可的方式來進行。一般說來,它要麼以煽情劇的方式要麼用田園的方式來解決矛盾……』(251)。利奧·馬克思認為蔡斯的書令人信服地闡述了美國經典作品中『難以捉摸的美國性』。田園理想在美國的移植、生根、發芽、變體過程,是其在美國特殊環境倫理影響下的生產過程,是美國迅速工業化的過程,其中交織的價值或意義衝突深刻而又複雜。其在美國文學作品中呈現的各種複雜的田園敘事變體也正是『難以捉摸的美國性』的形成過程。到上個世紀之交,這種對文化矛盾的辯證記錄正在成為美國文學的程式化用法。霍桑 1844 年『睡谷』的隨意記錄到此已生發成『一種精致複雜、包羅萬象、悲劇性的主題格式』,成為書寫美國的『主導理念』(255)。

《花園》一書自出版以來,一直深受國外學界關注。米克爾批判《花園》一書過於倚重像《白鯨》這樣的『高雅』文化,坎利夫認為《花園》對美國原始主義著墨過少,忽略了對庫柏等代表作家的分析,《花園》提供的只是美國田園理想的『某些版本』,麥克唐納也指出,利奧·馬克思可能把花園理解為一種中間意象,但他認為花園早已淪落為一種已失敗和死亡的文化的反諷存在(MacDonald 1988)。歸根結底,起源於歐洲的複雜田園理想是一個『關於文明的夢想』(Compton 1965: 73),機器突然侵入花園所呈現的問題從根本上講不屬於藝術,而屬於政治。坎納沃的看法就積極得多。他認為田園理想里的花園意象和機器意象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是理解當前美國環境政治里的衝突和緊張的關鍵(Cannavo 2001: 81)。這無疑為田園理想在新世紀的出路又指出了新的方向。利奧·馬克思在《花園》的開篇就指出了日常生活中盛行的情感型田園理想及其隱含的雙重性,即一方面我們繼續享用科技文明的成果,享受文明帶來的財富,另一方面又通過各種休閒活動,『逃離城市』,在鄉村風景中或荒野中尋求庇護。基於此,在生態危機四處蔓延、生態研究日益蓬勃的今天,重新審視《花園》中田園書寫涉及到的荒野作用、風景的救贖作用以及城市作為『生態寄生蟲』等問題的內涵就具有了當下意義。在環境問題日益受到關注的今天,田園理想也許可以作為解決當前工業社會和生態危機的政治選擇之一。新世紀,田園理想會譜寫甚麼樣的新篇章、迎來何種事件性的變化讓人期待,



《花園》一書的深刻內涵也亟待國內學者的深度挖掘。

注釋

- ① Cannavo 在 “American Contradictions and Pastoral Visions: An Appraisal of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2001) 一文中提到,20 世紀 60 年代有三部有關西方自然觀的著作非常有影響力,它們分別是 Leo Marx 的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1964)、Roderick Nash 的 *Wilderness and the American Mind* (1967/1982) 和 Clarence Glacken 的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1967), p. 74。
- ② 為簡約、方便,下文中提到《花園裏的機器:美國的技術與田園理想》一書時皆以『《花園》』代替,相關書中引用直接標註頁碼。
- ③ 比爾德在《從蠻荒到帝國:美國文明的興起》一書中指出,在殖民開發初期,前往美洲的移民幾乎全部是英國人(19-58)。
- ④ 關於『中間環節』的詳細內涵,可參閱洛夫喬伊的《存在巨鏈》中的第六講『18 世紀思想中的存在之鏈,及人在自然中的地位和作用』,pp. 245-280。
- ⑤ 阿特里奇在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一書中對這種『它者』和『關係狀態』給予了界定:“Otherness, that is, produced in an active or event-like relation—we might prefer to call it a relating; the other as ‘other to’ is always, and constitu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turning from the unknown into the known, from the other into the same.” (p. 29)

參考文獻

- ① 查爾斯·比爾德、瑪麗·比爾德:《從蠻荒到帝國:美國文明的興起》,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2014 年版。
- ② 艾倫·布林克利:《美國史:1492-1997》,海口:海南出版社,2009 年版。
- ③ 阿瑟·O·洛夫喬伊(著),張傳有、高秉江(譯):《存在巨鏈——對一個觀念的歷史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年版。
- ④ 利奧·馬克思(著),馬海良、雷月梅(譯):《花園裏的機器:美國的技術與田園理想》,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 年版。
- ⑤ 亨利·納什·史密斯(著),薛蕃康、費翔章(譯):《處女地——作為象徵和神話的美國西部》,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
- ⑥ Attridge, Derek. *The Singularity of Literature*. Routledge, 2004.
- ⑦ Buell, Lawrence.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Thoreau, Nature Writing, and the Formation of American Cultur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⑧ Cannavo, Peter F. “American Contradictions and Pastoral Visions: An Appraisal of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Organization & Environment*, vol. 14, no. 1, 2001, pp. 74-92.
- ⑨ Compton, Neil.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Book Review).” *Commentary*, May 1, 1965, pp. 73-76.
- ⑩ Cunliffe, Marcus. “Review: Collision Course,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 in America*. By Leo Marx (O. U. P., 48s).” *The Spectator*, January 22, 1965, p. 106.
- ⑪ Eagleton, Terry. *The Event of Literatur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
- ⑫ MacDonald, R. D. “Thomas Chandler Haliburton’s ‘Machine in the Garden’: Applying Leo Marx’s Criticism of America to Haliburton’s *Clockmaker*.” *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 vol. 19, no. 2, 1988, pp. 165-180.
- ⑬ Meikle, Jeffrey L. “Leo Marx’s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vol. 44, no. 1, 2003, pp. 147-159.
- ⑭ Woodman, Harold D.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Technology and the Pastoral Ideal in America* (Book Review).” *Technology and Culture*, Fall 1965, pp. 661-664.

(Editors: JIANG Qing & Derrick MI)